



## 现实与浪漫的两翼 ——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文/左衡

对于关爱中国电影观众们来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仿佛一句口令,它通往那个美丽而又神秘的西部边疆,又指向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座高峰。如果说,在十七年时期,大银幕上的新疆故事还不得不由来自东部的电影人开启讲述,那么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天山南北的艺术家们可以讲述新疆的故事。事实上,他们讲故事的声音是如此响亮,以至于已经沿着一带一路的方向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当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家采用红色经典《冰山上的来客》里这句话作为其新片名字的时候,可能无意间给观众带来一个美丽的误会,以为这部影片是在原来故事上的延续。高黄刚编剧、阿不都克力木·阿不力孜执导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下称《花》)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在中国电影人不懈努力、讲好中国故事的电影事业角度上,我们又确实不妨把两部作品联系起来,则一定会油然而生出无限感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相似的是初心,不同的是创新。

这部新作取材于帕米尔高原上中国塔吉克族护边员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三代守护国的事迹。在父辈影响下,拉齐尼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从少年到成年,一直行走在西部最危险的边境线上,他见证着、也积极参与着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2021年初,拉齐尼进入喀什大学进修,在校园里,为拯救落入冰湖的儿童,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追授拉齐尼“时代楷模”称号。

拉齐尼的事迹无疑是感人的。要把这些事迹搬上大银幕,则还需要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事实上,英雄题材的艺术作品创作的难度近些年来越来越高,而最难之处往往不在“立主题”,而在“脱窠臼”。从这点来看,《花》采用的叙事方法——也可以说是叙事策略——尤其值得留意。

一方面,影片剧情的时间跨度相当大,另一方面,许多重要剧情段落呈散点分布,拉齐尼要在影片开始后一段时间里才渐渐走到观众的焦点位置。这种叙述处理,和我们日常观看剧情片的习惯颇不相同。但如果将其放置在人类叙事活动的历史中,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在笔者看来,《花》的剧情安排和着力分布,带有大型民间文学甚至是史诗叙事的特点,即一定要把故事的起始、酝酿交代完整,在时光缓缓流逝中出现的人物依次来到我们眼前,然后又以出乎意料之外、合于情理之中的自然方式逃离,留下震撼和回味。通过人物书写历史,这种时间观甚至从主人公所属民族的取名法则中就有所显现,拉齐尼是他的本名,巴依卡则是他父亲的名字,文化就这样代代传承,潜移默化。

与此相呼应,解放军叔叔刘红军给予拉齐尼另一种红色精神传承。也是从这一角色开始,进入动人心魄的强情节。简要梳理可以发现,影片里有四次死亡:一,拉齐尼的小妹妹在上学路上坠下山崖,刘红军没能拉住她;二,山石滑落,刘红军推开拉齐尼,自己被击中头部;三,陪伴拉齐尼巡边十多年的牦牛“汗恰”摔断了脊椎,人们不得不把他留在雪山路旁等待必然的死亡;四,是拉齐尼为孩子被冰湖吞没。此外,还有四次人物在生死关头获救的情景:a,少年拉齐尼被刘红军救下,b,战士王烈被拉齐尼从冰缝里拉出,c,刘红军的儿子刘朝朝固执地要重走父亲生前险路,高原反应严重几乎送命,d,校园里小男孩落入冰湖。这些场景的关联和重叠格外值得关注:首先,一和二、二和d,分别构成刘红军与拉齐尼的心理动因;其次,一和b的人物身体姿态高度相似,而结果相反;再次,二和c、三和d都突出了危险和选择的命题,这些都显现出一种叙事技法的自觉。故事是世界文化交流的“硬通货”,重视叙事才能提升通货的价值。

“路”的意象串起了上述情节、场景和命运。“路”是人物现实中极其重要的存在,又是新疆人民生活形态变迁的表征,还是中国道路从创业艰难终于到通达坦荡的隐喻。

如果说在欣赏大美新疆好故事的过程中,笔者也还有些不满足的话,叙述视角会是一个问题。在古老的叙事长诗里,那个讲故事的人往往决定了接收者与故事的距离。假如影片把拉齐尼本人设定为这个讲故事的人,那么讲述的起点或许从喀什大学开始更有分量感,那是他可以回溯家族历史和人生轨迹的一段安静时光,却又是他即将到来的人生终点,于是将出现一部属于拉齐尼的“我的大学”。假如是刘朝的视角,那么对广大观众尤其是年轻人而言,作为一个从发达地区来到新疆的工程

师,他先天带有今天所谓“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的状态,这反倒会更容易把那些对新疆并不了解的观众带入艺术情境,在沉浸的过程中慢慢放下原有的成见、误解乃至偏见,从而达到认同的效果。

叙事策略的现实主义定位,与影像的纪实美学追求在《花》中结合得相当自觉。不得不提,大美新疆的景物、景观,当地民族风貌特征,实在是新疆影像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和资源,本色即可上镜头。影片的影像,一类倾向于纪实,如牦牛在冰面上行进,战士用布条包裹牛蹄防滑,拉紧绳结时细小的冰霜弹起又被劲风吹散,这个镜头质感惊人。另一类是意象和符号层面的,如片头国境线上堆叠石块地标,顶端立起一块近似中国地图形状的石块,勒上“中国”。笔者向导演阿不力孜求证过,这块石头是特意挑出来了。还有一类,则是仪式和神话层面上的,如戍边士兵轮替时的宣誓,如护边员和战士们与“汗恰”的生死诀别。有必要提请注意,凡此种种,都有赖于摄影团队在极端条件下的全心创作,用光影、色彩、形状,把新疆的地理和物理转化为电影叙事里典型环境。

新疆的美,往往与险并存;而险,又给人类生存带来恶劣的条件。拉齐尼小妹妹坠崖一场,地形地貌的瑰奇,与孩子们于岩缝间匍匐前行的弱小身躯构成了惊心动魄的对比,悬崖下淹没小妹妹的河水,碧绿如翡翠,美则美矣,却何其残酷!这里多说一句:文明的命题就在自然与生存的矛盾中彰显了出来。从这角度再来看护边员,会意识到这个职业其实具备了承载和建构现代文明的功能,这些又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拉齐尼生前常说,“这辈子就一直做一名不穿军装的边防战士,永远守好祖国的边境线”,这是今天帕米尔高原雄鹰的庄严宣誓。

影片的音响、音乐,有效地加入了叙事和影像。《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被重新编曲演绎,更富于民族音乐的风味,也更有现代音乐的情调。同时片中有许多首新曲新歌,民族语言的吟唱让观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万方乐奏有于阆”的情景再次油然而生认同和感动。塔吉克族宝贵的乐器鹰笛,在影片里承担了多个重要功能。那对鹰笛取自鹰两翼的骨骼,它最早是巴依卡赠给刘红军,作为兄弟情谊的纽带;多年后双笛重聚,连结起一代拉齐尼和刘朝朝的生活轨迹。随着拉齐尼的牺牲,鹰笛再次映入我们眼帘,成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宏大主题的现实象征物。

在笔者看来,《花》的艺术观念,其实也有两翼,一边是现实主义的事迹,一边浪漫主义的颂歌。前者是自觉的,后者则出自天影厂艺术家的激情与气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切有追求、有本领的文艺工作者要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激励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这实在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当然,同时也寄予了殷切的厚望。在笔者看来,《花》的动人之处正在于那份来自新疆的浪漫,它会在你看到、听到的第一时间就带来震撼。笔者甚至忍不住向本片的编剧、导演、摄影等一众艺术家提出,希望他们下一部作品能更彻底地释放出他们的浪漫激情。

当然,艺术实践的道路方法还尽可以可以持续探讨和摸索,宣发反倒是切近可以做的工作。《花》的影像形态,其实特别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加以传播。甚至未收入正片的素材,相信其中也有千姿百态的新奇观,这些都可以开发应用。而一旦传播度达到一定数值,受众又会参与进来自发生产新的自媒体产品。至少,主创团队的几位艺术家都具备“自带流量”的潜质。

在2021年9月举办的“讲好中国新疆故事·新疆电影发展研讨会”上,一位专家指出,天影厂创作生产的电影是新中国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天影厂创作的影片照现实生活,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与进步,天影人对创作精品、执着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总路和传颂。的确,天影厂拥有得天独厚的电影资源,拥有贯通亚欧大陆的文化空间和舞台,拥有成建制的工业基础,艺术家团队则有着在今天格外宝贵的工匠气质。《花》的出现,让我们天影厂以及新疆电影的未来都充满期待。

(作者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 以“跨类型”开放思维 提升主流电影的市场价值 ——解析红色经典电影的“多样化”经验

■文/祁海

弘扬正能量的主流电影能不能在市场打响?

当然可以,几十年前已有不少成功先例。

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映展播的优秀影片,有多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的主流电影,当年上映时票房挺红火,并不需要包场红头文件。

那个年代的群众革命热情高,国产电影未面临进口大片和电视、网络的竞争,这是当时红色经典电影卖座的重要因素,但不是首要因素,因为当时有一些高喊政治口号的影片并不受欢迎,关键还是看作品质量。

十七年时期,观众喜爱的红色经典电影,不仅制作精美,还有一条共性规律:多数不是严肃正剧,大胆借鉴商业类型片的手法,而且是“跨类型”,即是在一部影片中同时让多种类型片的元素杂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过于追求“风格统一”,卖点就大大丰富了,一扫单调枯燥之弊。

### ► 温故

#### 1. 战争片的多样化

《上甘岭》、《英雄儿女》、《红日》、《董存瑞》都是火爆壮观的战争片,但并非只见战斗场面,表现手法多样化,节奏有张有弛。

如添加一点搞笑的喜剧色彩:民兵董存瑞、战士王成嘻皮赖脸纠缠首长,粗犷的连长张忠发、石东根,打了胜仗就像小孩似的乐不可支,或是喝了庆功酒豪醉意挑着大盖帽策马狂奔,这些描写充满生活乐趣,并不无聊,使英雄显得更真实。《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地下党员吴有贵与日寇头目松井的较量,多是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小灵鼠玩老猫”的戏弄式智斗,气得老贼直跳脚;《地雷战》描写日军工兵专家排雷,小孩施巧计让他沾两手臭屎……观众无不开怀大笑。

这些火爆战争片刚柔并济,还有抒情浪漫的歌曲,音乐风格和演唱方式不断出新,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提高了影片的票房号召力。如男女战士深情共唱《我的祖国》,沂蒙少女高歌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铁道游击队》的琵琶吟唱,先是抒情的男声独唱,紧接的合唱不是男女混声大合唱,而是欢乐快速的男声小组唱,电影插曲采用这种男声组合,至今也不多见。《红色娘子军》则有充满柔情的多声部女声小合唱,一群青春女兵轻唱:“野火炊烟椰子香,满天星月照山岗……”,富有优美动听的琼剧和黎族民歌风味,使表现艰苦岁月的电影充满清新的形式美。故事片《英雄儿女》表现部队工团生活,借此引进舞台艺术片手法,展现大型音诗《英雄赞歌》以及舞蹈、曲艺说唱。

那个年代的军旅电影也有青春片。《柳堡的故事》描写新四军战士李进邂逅水乡姑娘二妹子的纯洁恋情,饱含诗情画意。片头字幕衬底是手绘的恬静田园景象,一下就凸现了影片抒情基调。李进作战英勇,但并非五大三粗,而是眉清目秀的帅哥,能写会画,歌喉清亮;二妹子窈窕秀丽,羞涩含情。民歌风格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欢愉优美。这部黑白片的造型设计很讲究,苏北水乡风光拍出水墨国画韵味,就连部队行军也是在一畦畦水田的田埂通过,一行行队列直线的水中倒映,线条光影格外美。

## 《马蹄声碎》： 呼唤我的名字

■文/周夏

有一句台词,与主线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些场景与西部空镜头的插叙闲笔给影片带来了一种悲凉的基调;片末,少枝濒死前的主观镜头极具仪式感,一群藏民骑马飞奔而来、围观,影影绰绰的神秘光影中,女红军齐刷刷穿着蓝色军服齐步走,红领巾、红领结,还有草鞋上的红绒球却异常醒目,一片蓝色中的一抹红,这是少枝临终时的女性意识、革命理想,带着对生命的极度渴望,恍然入梦。

影片的另类还在于鲜明的女性化叙事,相对于“第五代”男导演醉心于民族寓言宏大叙事的构筑,刘苗苗却把镜头对准了被大部队抛弃的八个红军女战士,投入到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中。她也直言这部小说打动她的地方是写了女兵,而在红军长征历史上,她们差不多是被人遗忘的状态。这八位女红军的群像自然、生动,普普通通但个性突出,班长成熟稳重,“大脚”豪放简单,少枝内秀,隽芬爱美,小华子和妹则是娃娃军,董大姐和另外一位女红军戏份较少,面目有点模糊。与以往女战士男性化的英雄叙事相比,这部影片反而要在战争环境中极力突显女性特质,比如班长提醒女同志要注意生理期卫生,虽然战争让女人慢慢异化为男人,成为男性军队的一份子,但在她们的心底还是保留着自珍的女性身份,尤其是隽芬,她的遗物是一条扎着红头绳的长辫子,这有着强烈的女性自我的性别指认情结。

影片主要展现了长征路上日常生活的场景,八个女红军在水边嬉戏,围着篝火唱歌、夜谈,谈的是自己的过往,还有对未来另一半的畅想,隽芬伤感地谈起父亲带着自己卖唱,曾经遇到的一个小情郎被国民党抓了,死了;班长动情地谈起离家前和父亲吵了一架,家人都被反动派杀害了。这都是战争片中少见的私密情感经验表达,显露出曾经的心理创伤和对未来的企盼。尤其是影片开场少枝和陈团长之间暧昧不清的情感,露营之夜陈团长和少枝走到了一起,拥抱了一夜,在战争背景下谈爱情是奢侈的,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男女互相吸引的原始冲动,是彼此激发的情愫,这引起了隽芬的嫉妒,直至后来二人矛盾爆发。女性小团体里不仅有抱团取暖的温情和欢乐,也有微妙的小摩擦,性格、观念上的冲突和对立,影片并没有掩饰这些矛盾,而是如实展现,细腻传递,隽芬把少枝视为

#### 2. 惊险片的多样化

十七年时期的优秀惊险片,各有特色:《智取华山》是“风光惊险片”,借鉴风光片,描写解放军突破西岳华山天险全歼守敌,勇士们既要攀越险峰,又要对敌作战,构成双重悬念。

《铁道游击队》是“动作惊险片”,借鉴武俠片,游击队员要跳上飞驰电掣的火车,险象环生,这可是鲜见绝活!

一些惊险片是“情节惊险片”,以曲折的故事吸引人。《渡江侦察记》描写解放军李连长率奇兵潜入布防严密的敌后方窃取情报;《英雄虎胆》、《羊城暗哨》描写侦察英雄曾泰、王练冒名顶替闯虎穴与狡猾匪首较量。惊险片《英雄虎胆》也有感情戏:漂亮女特务阿兰小姐居然爱上我军的曾泰!《羊城暗哨》首次在反特片中引进风光片,展现浓郁的南国都市风情。

#### 3. 农村片的多样化

云南乡土题材电影《五朵金花》在城市影院的票房也很火爆,是因为该片具有城市观众也感兴趣的许多卖点。该片博采青春片、喜剧片、音乐片、风光片、民俗片之长,描写白族小伙子阿鹏热心助人,并在“三月街”赛马中奋勇夺魁,赢得金花姑娘的芳心。这对俊男美女在蝴蝶泉边对唱,按白族习俗相约一年后再见。金花故意不留姓名,让阿鹏在苍山洱海的茫茫人海中找她,考验男方诚意和能力。阿鹏在寻人过程中,遇到多位也名叫金花,分别从各种新兴行业的漂亮白族姑娘,引出连串搞笑的误会巧合。以上构思反映现代少数民族的新生活,不会枯燥,观众乐意接受。(下转第10版)

想象中的情敌,“大脚”瞧不起隽芬的娇媚气,在追赶大部队的途中还发生了班长易人的小情节,女红军目睹女同胞被强奸却未援手,这点上班长冯贵珍和队员发生了分歧,大家民主推举“大脚”当班长,后来,当“大脚”意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个职位,又把“班长”还给了冯贵珍,达成了女性之间的和解。

另外,影片对死亡的描写客观而冷静,没有太多煽情,反而更真实和残酷。陈团长被炸掉双腿,不愿拖累大部队而开枪自杀;隽芬和小华子看到岸边死掉的马匹,激动地想把它拉回去给姐妹们充饥,却无情地被急流冲走,消失得无声无息;过草地时,大自然环境极其艰苦恶劣,她们时时刻刻面对着饥饿、劳累、疾病的威胁,衣衫褴褛地走在生与死的边缘……影片最令入感动的一幕是班长冯贵珍点名,带领大家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手印,以此证明八个女红军都是长征路上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前途生死未卜,她们带着赴死的心情按下这个手印,使得这个仪式化的场景异常悲壮,体现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我忽然联想到《狙击手》最后点名的一幕,当牺牲的战士们名字一个个被喊出时,热泪盈眶。少枝倒下的一瞬间大声喊出自己的名字:“我叫少枝!”不仅呼应了陈团长对自己名字的询问,也是对个体价值的体认。死亡带来一种绝望的气息,而活着也体现了一种超越极限的生命意志,八个女红军经常一起唱歌,就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当大部队撤离,班长用一张纸编了个善意的谎言,激励大家继续走下去;行军路上,“大脚”突然双脚麻木,班长鼓励她唱军歌,大家一起唱,她又可以走路了,闪现了精神胜利的奇迹。最后八个女红军剩下五个,她们赶上了大部队,凭着超强的意志和信念活了下来。

《马蹄声碎》在国内上映时只卖了7个拷贝,却在第11届意大利都灵电影节获得一致好评。这种独特细致的战争片体现了普遍的人性、反战的情绪,没有高歌英雄主义,反而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35年的岁月洗礼之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先锋和前卫。唯一感觉有点跳的是片中关于长征的三处文字说明,配以男声雄浑的独白,似乎把女红军的个体小世界打破了,而被强行拉回到一种宏大的集体主义的召唤之中。